

《浙东备倭议》考*

刘恒武 杨心珉

内容摘要:《浙东备倭议》系《殊域周咨录》书中收录中的一篇明代有关防倭经略的重要议文。将其与嘉靖《宁波府志》、《筹海图编》所载相似内容予以核照,可以确定《浙东备倭议》作者应是明嘉靖时期曾出任过南京兵部尚书的鄞人张时彻,撰成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其未见于现存《芝园定集》、《芝园别集》和《芝园外集》等张时彻个人文集的原因,则可能是编者之所未经见。

关键词:《浙东备倭议》 张时彻 《芝园集》

《浙东备倭议》是明人严从简所著《殊域周咨录》卷之三《日本国》中随文载录的一篇议文,这篇文章不仅周详细致地分析了浙东沿海的边务状况,而且指摘积弊、条陈对策,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建设性的备倭方略,是一份研究明代浙东海政的重要文书史料^①。然而,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引录这篇议文时,只标出了文章题目,亦未添附任何题解文字,这就使得文章的作者及撰写年代成为疑问。收载《浙东备倭议》的《殊域周咨录》是一部主要记述明朝边疆事务、对外关系的著作,书中大量资料源自嘉靖末年书作者严从简在行人司担任行人一职时接触到的文书档案,《浙东备倭议》即应是严从简辑录的一份由地方报送至朝廷的边务议文,故此,弄清此文的作者、撰写时间及其颠末,无疑将有助于明季浙东海疆政策变化经纬的考察。

一、《浙东备倭议》的作者

《浙东备倭议》这一议文篇名仅见于《殊域周咨录》,在其他各类明史文献中均未出现。因此,《浙东备倭议》相关背景的稽考只能从议文自身内容切入。《浙东备倭议》中的述实与建言主要涉及明中期以来宁波、舟山一带的防倭经略,从议文所载资料数据的详备程度来看,作者对于浙东沿海的地理形势

*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学术攀登项目(PD2013083)阶段性成果。

①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89-98页。

及边务状况了如指掌,应当参与过防倭活动或浙海边务筹划。

笔者首先查阅其他论及浙东防倭事宜的明代著述,试图通过内容对比找到《浙东备倭议》作者的有关线索,结果发现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海防书》后半节论及浙东防倭经略的内容与《浙东备倭议》文意大体一致、行文结构也基本相同,唯两者在部分具体内容和语句表述上存在差异^①。嘉靖《宁波府志》并未言及此节内容引自他处,显然是将其作为志书的自撰文字纳于卷中的。嘉靖《宁波府志》纂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主纂人为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府志》中这节与《浙东备倭议》内容相近的文字一定出自张时彻之手。根据嘉靖《宁波府志》目录之前所列“修志氏名”,《府志》的参纂者还包括市舶提举司提举种祚、宁波府下辖鄞县知县田登年、定海县知县陈正道等6位地方官员,以及宁波府学和各县县学的13位生员^②,而志书各卷的实际执笔者并不明确。

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查阅,笔者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上《经略三》和同书卷十二下《经略四》中发现了4个段落与《浙东备倭议》及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海防书》有关内容相近,更为重要的是,其中3个段落的文头写有“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云”,表明这3段文字是《筹海图编》辑录的张时彻言论。以下就将上述3种文献中重合互见的4段文字分别列表进行对照比较,列表序号依照这些文字在《浙东备倭议》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定:

表(一)中的三段文字基本一致,唯个别细节互有异同,其内容主要介绍舟山群岛以及宁波沿海海上防务状况。其中,《筹海图编》的这段文字载于《筹海图编》卷十二上《经略三·勤会哨》,内容相对简质,文中未出现《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海防书》所载“总参标下各选练精兵三千,以听征剿”一语^③。《浙东备倭议》中出现的双行夹注“近年议将总参标下陆兵更属海道兵备训练,仍各选亲兵一千随征”(上表括号内文字)不见于《筹海图编》和《府志》^④。《府志》对于地名的罗列最为详细,而且有“吾郡之南(北)境可以无虞矣”之语,透露出志书纂修者的地域归属意识^⑤。

表(二)《筹海图编》文字见于该书卷十二上《经略三·御海洋》^⑥,与表中

①参见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据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刊本影印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83年,第1724-1760页。这节内容起自卷二十二“祖宗之制,于边海郡县,经营控制为备,盖至严也”,迄于该卷卷末“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舞阶之风,又何必规规□效于甲兵之未乎”。

②参见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之《修志氏名》,第21-22页。

③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十二上《经略三·勤会哨》,中华书局,2007年,第778页。

④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2-93页。

⑤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第1737-1739页。

⑥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十二上《经略三·御海洋》,第766-767页。

《筹海图编》、《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相近内容对照表（一）

《筹海图编》	《浙东备倭议》	嘉靖《宁波府志》
复于沈家门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指挥领之。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指挥领之。舟山驻扎把总，兼督水陆。贼若流突中界也，则沈家门、马墓港兵船北截，过长塗、三姑山，而与浙西兵船相为犄角。南截过普陀、青龙洋、韭山，而与温、台兵船相为犄角……总兵督发兵船，为第三重，备至密也。	复于沈家门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指挥领之，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指挥领之，把总驻扎舟山，兼辖水陆，总参标下各选练精兵三千，以听征剿（近年议将总参标下陆兵更属海道兵备训练，仍各选亲兵一千随征。）定海则屯聚重兵，屹为巨镇。贼或流突中界，则沈家门、马墓兵船迤北截，过长塗、霍山洋、三姑，与浙西兵船为犄角，迤南截过普陀、桃花、青门关，与昌国、石浦兵船为犄角……总兵督发兵船为第三重。	复于沈家门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指挥领之。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指挥领之，把总则驻扎舟山，兼辖水陆。而总参标下各选练精兵三千，以听征剿。定海则屯聚重兵，屹为巨镇。贼或流突中界，则沈家门、马墓兵船迤北截，过长塗、霍山洋、三姑，与浙西兵船为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无虞矣。迤南截过普陀、青龙洋、韭山、青门关，与昌国、石浦兵船为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无虞……总兵督发兵船，为第三重。

所摘《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两节文字相比，除了个别细节的差异之外，语句基本一致，其文意主要强调主动迎击海上来犯之敌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浙东备倭议》文中双行夹注“戊午，参将张四维擒朱家尖寇。己未，总兵卢镗歼三沙之寇”（上表括号内文字）^①，亦见于嘉靖《宁波府志》夹注，只是在个别字词上有微小区别^②。另外，上述三段文字均以夹注“此言水（海）战以击来贼为奇功”收尾（上表括号内文字），“水战”在《筹海图编》中写做“海战”。

表（三）《筹海图编》文末夹注为“此言浙江互市，必不可行。大意与兵部主事黄元恭之说相同，而剖析利害，尤为明备。”^③《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文末夹注则分别作“此言蕃舶不可通”、“此言番船不可通”^④。然而，就表中三节文字的细节而言，《筹海图编》与《府志》更为一致，例如：《筹海图编》之“非南海诸番全身保货之比”、“殷监不远，元事足征”等文句，《府志》亦作相同表述，《浙东备倭议》则分别作“非南海诸番惜身重命保货之可比”、“殷鉴不远，往事足征”^⑤。

①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6页。

②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第1747-1748页。

③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十二上《经略三·御海洋》，第852页。

④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7页；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第1754页。

⑤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十二上《经略三·御海洋》，第851页；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第1753页；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6-97页。

《筹海图编》、《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相近内容对照表（二）

《筹海图编》	《浙东备倭议》	嘉靖《宁波府志》
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云：“今之水战，止能邀击去贼，而于贼之来者，未能遏其锋。夫来贼锐而去贼惰，击惰易而攻锐难，人情所习知也。然击来贼者，譬之扑火于方然之始。火灭则栋宇可以无虞。击去贼者，譬之收燎于既烬之后，此其厉害则有间矣。自海上用师，击来贼者仅一二见；而邀去贼者，亦不过文其纵贼不追之罪耳……急如救焚，尽遏海外方来之寇，则边鄙又何事不宁耶？”（此言海战以击来贼为奇功。）	议者又曰：今之水战止能邀击去贼而已，未能遏来者之锋。夫来贼锐而去贼惰，击惰易而攻锐难，人情所皆知也。然击来贼者，譬之扑火于方然之始，火灭则栋宇可以无虞。击去贼者，譬之收燎于既烬之后，此其厉害则有间矣。自海上上下师击来贼者仅一二见，（戊午，参将张四维擒朱家尖寇。己未，总兵卢镗歼三沙之寇。）而邀去贼者亦不过文其纵贼不追之罪耳……急如救焚，则边鄙又何事不宁耶！（此言水战以击来贼为奇功。）	或谓今之水战，止能要击去贼，而于来者未能遏其锋。夫来贼锐而去贼惰，击惰易而攻锐难，人情所习知也。然击来贼者，譬之扑火于方然之始，火灭则栋宇可以无虞。击去贼者收燎于既烬之后，此其厉害则有间矣。自海上用师击来贼者仅一二见，（戊午，参将张四维擒朱家尖之寇。己未，总兵卢镗歼三沙之寇。）而要击去贼者亦不过文其纵贼不追之罪耳……急如救焚，尽遏海外方来之寇，则边鄙又何事不宁耶？（此言水战以击来贼为奇功。）

《筹海图编》、《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相近内容对照表（三）

《筹海图编》	《浙东备倭议》	嘉靖《宁波府志》
兵部尚书张时彻云：“或谓定海沿边，旧通番舶。宜准闽、广事例，开市抽税，则边储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诸番全身保货之比。防严禁密，犹惧不测，而况可启之乎！况其挟货求利者，即非脯肝饮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锋镝者，必其素无赖藉者也。岂以我之市不市，为彼之寇不寇哉！殷监不远，元事足征……此皆利害之较然者也。乃谓可以足边储，而弭外患，斯不已大谬乎？”（此言浙江互市，必不可行。大意与兵部主事黄元恭之说相同，而剖析利害，尤为明备。）	议者又曰：定海缘边旧通番船。宜准闽广事例，开市抽税，则边储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诸番惜身重命保货之可比！防严禁密犹惧不测，而况可启之乎！况其挟货求利者非脯肝饮血之徒，捐性命犯锋镝者必其素无赖藉者也，岂以我之市不市为彼之寇不寇哉！殷鉴不远，往事足征。……此皆利害之较然者也，乃谓可以足边储而弭外患，不已大谬耶！（此言蕃舶不可通。）	或谓定海沿边，旧通番泊。宜准闽广事例，开市抽税，则边储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诸番全身保货之比。防严禁密，犹惧不测，而况可启之乎！况其挟货求利者，即非脯肝饮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锋镝者，必其素无赖藉者也。岂以我之市不市，为彼之寇不寇哉！殷监不远，元事足征。……此皆厉害之较然者也。乃谓可以足边储，而弭外患，不已大谬乎？（此言番船不可通。）

表(四)中摘录的《筹海图编》文字见于该书卷十二下《经略四·通贡道》^①,表中《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海防书》文字则均载于文末,紧接表(三)所摘内容^②。三段文字大意相同,但在细节内容上各有

《筹海图编》、《浙东备倭议》和嘉靖《宁波府志》相近内容对照表(四)

《筹海图编》	《浙东备倭议》	嘉靖《宁波府志》
兵部尚书张时彻云:“倭寇悔祸,或扬帆称贡而至,将何以处之?昔杨文懿公尝著却贡之议,曰倭人狙诈狼贪云云。(见后杨尚书守陈条陈下)且前此人寇之频,盖以通番下海,勾引向导者多也……则奸谋狡计破阻不行矣。今之议者,复曰昔三代盛王……王者内夏外彝,修之有道。军志亦曰:‘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此岂安攘之长策哉!迨者,台省部寺会疏奏行九事,一曰选武将,二曰任文职……而外树威严之绩。如其且寇且贡,反覆不情,则用威让之令,文告之辞,以却绝之。是恪遵太祖高皇帝之明训,义之所以为尽也。如其引愿伏罪,重译效款,必欲率宾王化以自纳于覆载之中,则必质其信使,坚其誓约,敕令禁戢各岛,不复犯我边疆,期以数为断,共命不渝,而后如先朝著例,容令人贡。此成祖文皇帝绥徕远人之方,仁之所以为至也。是故明征定保,君子监成宪而行之,修治垣隍,慎固封守,一策也;……所谓为吾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在乎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焉可也。”	议者又曰:倭寇悔过,或扬帆称贡而至,又将何以处之?昔杨文懿公守陈尝著却贡之说,谓其受贡亦侵,不受贡亦侵。今倭奴已为讐敌,乃于拘隙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狼贪之心,而欲售其谲计,其罪不胜诛矣,况可与之通乎?且前此人寇之少,以通蕃下海勾引向导者少也,今兹入寇之多,以通蕃下海勾引向导者多也……则彼奸谋狡画破阻不行矣。如其引愿负罪,重译效款,必欲率宾,同于诸蕃,以自纳于覆载之中,则必质其信使,坚其誓约,谕令禁戢各岛不复犯边,期以数为断。若果能恭命不渝,而后如先朝著例,复许之贡,此则义之所以为尽,仁之所以为至也。是故明征定保,君子监成宪而行之,修治垣隍,慎固封守,一策也;……为吾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而已。然昔人有云: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故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又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干羽之舞,又何必规规责効于甲兵之末乎!	然则倭奴悔祸,或扬帆称贡而至,又将何以处之?昔杨文懿公守陈尝著却贡之议,曰倭奴狙诈狼贪,时擎舟载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今其狡计如前所陈,则非向化者矣,是受贡亦侵,不受贡亦侵。今倭奴最我讐敌,乃于拘讐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狼贪之心,而欲售其谲计,其罪不胜诛矣,况可与之通乎?且前此人寇之少,盖以通番下海勾引向导者少也,今兹入寇之多,以通番下海勾引向导者多也……则奸谋狡计破阻不行矣。今之议者复曰:昔三代盛王……是故明□保定,君子监成宪而行之尔已。修治垣隍,□固城守,一策也;……为吾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然昔人有云: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故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又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舞阶之风,又何必规规□効于甲兵之末乎!

①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十二下《经略四·通贡道》,第845-846页。

②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7-98页;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第1756-1760页。

繁简。《筹海图编》所引《军志》及“台省部寺会疏奏行九事”内容,不见于《浙东备倭议》和《府志》;《浙东备倭议》和《府志》结尾“然昔人有云”的内容未见于《筹海图编》;《府志》大段摘录杨守陈“却贡之议”的内容,而《筹海图编》和《浙东备倭议》对之仅是一笔带过。

以上表格所摘3种文献的互见文字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表(二)、(三)、(四)所列文字均系张时彻言论,这从《筹海图编》文头标注“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云”可以得到明证。除此之外,《筹海图编》卷十一下《经略二·募客兵》中摘录了一节张时彻反对招募客兵的建言^①,而《浙东备倭议》中亦载有同样观点^②。两者皆举“苗帅杨云”为例,相关文句颇为相近:

兵部尚书张时彻云:……由此而观,调募客兵,有害无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内地,间熟道路,习知土风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祸。如元末苗帅杨完者,流毒吴、楚,盖可鉴也。

——《筹海图编》卷十一下《经略二·募客兵》

使(客兵)久居内地间熟道路,习知土风,必有不戢自焚之祸。昔元末苗帅杨完之流毒于嘉禾,迨岁闽广之兵屡叛而从寇,益可鉴矣。

——《浙东备倭议》

据此可知,《浙东备倭议》中有关客兵之议也出自张时彻。在此需要言明的是,《府志》中没有出现上述列举杨完之例阐明调募客兵之弊的内容。

《浙东备倭议》前半部分主要介绍浙东边备状况,同时针对具体倭情提出革弊固防的建议,后半部分则就浙海边务政策表达了议者观点,这些观点依次为不募客兵、主动邀击海上来寇、禁绝倭人商舶、不宜轻许日本通贡,其中,后三项分别为表(二)、(三)、(四)阐述的思想。根据上述文献比照可以确定,《浙东备倭议》后半部分之核心内容均系张时彻言论,进而可以推断,《浙东备倭议》作者即是张时彻。另外,四库全书本《筹海图编》之《提要》云:“又若唐顺之、张时彻、俞大猷、茅坤、戚继光诸条议,是书亦靡不具载,于明代海防亦云详备。”^③可见,《筹海图编》参阅了张时彻等人有关明代海疆备倭的议文,《浙东备倭议》当在其中。

上述比较研究还可导出另外一个结论: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海防书》后半节内容应系《府志》主纂者张时彻亲自撰成。然而,必须指出,《浙东备倭议》在内容上与《府志》之《海防书》仍有差异,其作为一篇议文的独立性也不容忽视。下文将对《浙东备倭议》、嘉靖《宁波府志》和《筹海图编》三者的年代序列进行探讨,进而弄清《浙东备倭议》一文的前后经纬。

①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十一下《经略二·募客兵》,第727页。

②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5页。

③参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筹海图编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浙东备倭议》撰成的年代及其颠末

在探讨《浙东备倭议》的撰成年代之前,先对嘉靖《宁波府志》和《筹海图编》作一考察。首先,关于嘉靖《宁波府志》的完成时间,根据张时彻所撰《宁波府志叙》,嘉靖《宁波府志》的纂修“始于嘉靖己未(1559)九月十有六日,讫事于庚申(1560)五月六日”^①,由此可以确知,嘉靖《宁波府志》完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月六日。

在《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所作的自序中,并未明言该书完成的具体年月,但郑若曾自序作于嘉靖四十年(1561)十二月^②,该书初刻本开雕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正月^③,以此推之,《筹海图编》当定稿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内。

就《浙东备倭议》的撰成年代而言,虽无题序类材料可资考证,但由于这篇议文主要论述嘉靖时期浙东海政及倭情时务,故而可以从文章内容细节中推断其撰成的大致时间。首先,细读全文可以发现,《浙东备倭议》中最具时间标识意义的内容有三,其一是文中双行夹注“戊午,参将张四维擒朱家尖寇。己未,总兵卢镗歼三沙之寇。”^④此处“戊午”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己未”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筹海图编》中也有关于张四维朱家尖克敌和卢镗三沙之捷的记载^⑤,这两场战役时间十分明确;其二是正文中“而关口水陆之兵与招宝山威远城之筑实所以扼其冲”的语句^⑥,据张时彻《威远城建祠碑》记载,威远城的修筑“始于庚申春,凡三越月而告成”^⑦,庚申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其三是《浙东备倭议》论及沿海卫所军兵流失、多存空籍一节内容中附带的一条夹注:“今巡抚赵炳然奏准举行补足全伍官军。”^⑧查阅《明世宗实

①参见张时彻等纂修:嘉靖《宁波府志》之《宁波府志叙》,第13页。

②参见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之《筹海图编序》,第10页。

③参见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之“点校说明”,第4页。

④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6页。《浙东备倭议》中的双行夹注亦多见于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二《海防书》后半节,表(二)、(三)对此已有反映,故此可以推断,《浙东备倭议》文内所附夹注系议文作者张时彻自撰,而非《殊域周咨录》作者严从简添笔。

⑤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之九《舟山之捷》,第625页;同书卷之六《直隶倭变纪》,第415页。

⑥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3页。此处详细记载为:“由大浹口直走郡城,则西渡东津、桃花、梅墟之备不可以不严,而关口水陆之兵与招宝山威远城之筑实所以扼其冲。”

⑦张时彻:《芝园定集》卷三十九《威远城建祠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54页。

⑧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三,第95页。此夹注及其前后正文未见于《府志》。

录》可知,这条夹注指的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庚辰浙江巡抚赵炳然上奏并得到兵部准可的“海防八事”之第二事:“二振军伍,浙江军卫逃亡数多,请照籍清补。”^①“海防八事”之呈奏时间——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较之上文提及的三个年代都晚,《浙东备倭议》述及“海防八事”内容,这说明其最终完成时间应在嘉靖四十二年五月之后。此外,这条夹注中称赵炳然为“今巡抚”,可见《浙东备倭议》终稿并上呈之际赵炳然仍为浙江巡抚。再查诸《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条记曰:“恩罢(李)燧归听用,升巡抚浙江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赵炳然为兵部尚书代之。”^②由此可知,赵炳然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由浙江巡抚升任朝廷兵部尚书,这样,《浙东备倭议》终稿时间应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之前。总结上述分析,严从简著录的《浙东备倭议》一文定稿并上呈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之间。

根据以上研究,嘉靖《宁波府志》完成时间最早,《筹海图编》次之,《浙东备倭议》定稿时间最晚。然而,这一结果与上一节提出的《筹海图编》参阅了《浙东备倭议》这一推论有所抵牾,需要做进一步分析解释。关于《筹海图编》所引张时彻言论的出处,确实存在其参看《府志》之《海防书》的可能性,例如,在上节表(三)所列3段文字中,《筹海图编》文字与《府志》相应内容在词句细节上更为相近,而且在《筹海图编》卷末所附《参过图籍》中也明确列有《宁波府志》^③。然而,并不能就此断言,《筹海图编》所录张时彻言论均来自《府志》,例如,上节曾提到,《筹海图编》列举杨完之例阐述调募客兵之弊这段内容不载于《府志》,却见于《浙东备倭议》。此外,由上节表(二)、表(四)的文字比照可知,《筹海图编》所录张时彻言论中亦有更接近《浙东备倭议》的语句细节。如表(四)中《筹海图编》与《浙东备倭议》皆有以“如其引僇伏罪”开头的一段文字(表中以虚线标出),《筹海图编》至“容令人贡”止,《浙东备倭议》至“复许之贡”止,两者之间虽有个别文字的细小差异,但内容基本一致,大致阐述了依照日方态度考虑是否准其入贡的策略,而这一内容却未见于《宁波府志》。据此可以推断,《筹海图编》在编纂过程中应也参阅了《浙东备倭议》,那么,如何解释前文判定的《浙东备倭议》定稿时间晚于《筹海图编》?笔者认为,《筹海图编》完成之前,张时彻已经撰成了《浙东备倭议》的初稿,《筹海图编》的作者郑若曾参阅了张时彻议文初稿内容,《筹海图编》刊印之后,张时彻又根据时事状况对议文初稿进行了修订,大致于1563-1564年之

①《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二十一,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庚辰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528页。

②《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三十六,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701页。

③参见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之《附录·参过图籍》,第980页。

间完成最终稿并将之上呈朝廷,而严从简在行人司看到并辑入《殊域周咨录》的应是《浙东备倭议》的最终稿。

三、关于《浙东备倭议》未见于现存张时彻文集的原因

根据上文考证,《浙东备倭议》确属张时彻所撰。然而,在现存的张时彻个人文集中却找不到这篇议文。张时彻一生著述收于《芝园定集》、《芝园别集》和《芝园外集》三部文集,四川省图书馆藏《芝园定集》51卷、《别集》10卷和《外集》24卷是现存张时彻三部文集卷数最为齐备的一套,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现存这套文集中未见《浙东备倭议》。

关于张时彻三部文集的编成年代,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将其标注为明嘉靖刻本。其依据应当是,《芝园定集》卷首附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邹守愚撰《刻芝园集序》、嘉靖十八年(1539)湖广按察使司提督学校副使江以达撰《芝园集序》^①,《芝园定集》卷尾附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丰道生撰《芝园集后序》^②,三篇序均作于嘉靖年间。然而,《明别集版本志》指出,《芝园定集》卷三十七《柯希斋传》有“公生于弘治丁巳,卒于万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语,此外,《定集》卷十二有“《甲戌至日燕李山人读骚轩》、《乙亥新正四日月湖精舍小集》”^③。“万历甲戌”即万历二年(1574),“乙亥”当是万历三年(1575)。由此可以推定,虽然嘉靖年间《芝园集》就已汇编付梓,但之后又追加了张时彻晚年的作品并重新刊刻,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四川省图书馆藏《芝园定集》、《别集》和《外集》载有万历初年的作品,无疑是万历三年以后的刻本,与嘉靖年间出版的《芝园集》虽然名称相似,但并不能完全等同视之。另据上节的分析,《浙东备倭议》最终稿应当完成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这一年代范围,因此,就时间逻辑而言,《浙东备倭议》完全有可能被收入重新刊刻后的三集之中。

那么,为何目前存世的张时彻文集中未见《浙东备倭议》?在此,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四川省图书馆藏《芝园定集》、《别集》和《外集》在现存张时彻文集中卷数最为齐备,但未必完整保存了张时彻毕生创作的所有诗文作品。事实上,史籍中关于芝园诸集的卷数记载不一。《明史·艺文志》中记载张时彻著有“《芝园全集》八十五卷”,但未标明此《全集》包含了哪几部分集,也没有记录分集的卷数^④;《千顷堂书目》与《浙江通志》记载《芝园定集》56卷,

①参见《芝园定集》卷首所附邹守愚《刻芝园集序》、江以达《芝园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716-718页。

②参见《芝园定集》卷尾所附丰道生《芝园集后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385页。

③崔建英辑,贾卫民、李晓亚整理:《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页。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2477页。

《芝园别集》11卷,《芝园外集》24卷,共91卷^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指出,“定集当为五十一卷,别集当为十一卷,外集当为二十四卷,共八十六卷。(明)史误八十六为八十五,(浙江)通志误五十一为五十六。”^②在此,《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芝园定集》、《别集》和《外集》卷数的记载,与四川省图书馆藏芝园诸集卷数最为接近,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别集十一卷”与四川省图书馆所藏《别集》10卷有1卷之差。

就各集内容构成而言,《定集》包括诗赋、族谱、书启、叙、记、传、碑文、墓志铭、祭文以及史论等等;《别集》为奏议、公移;《外集》由《说林》和《续说林》两部分组成,主要收录各种论说性杂文。作为议文的《浙东备倭议》应被收入《别集》之中。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四川省图书馆藏《芝园别集》10卷中之所以不见《浙东备倭议》大致存在两种可能,以下分别对这两种可能做一说明:

第一种可能性是,《别集》确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浙江通志》和《千顷堂书目》等诸书所记,原为11卷,现今佚失1卷,而《浙东备倭议》恰在佚失的1卷之中。前文已经提到,早在三部文集刊刻之前的嘉靖时期应该已有名为《芝园集》的张氏文集问世,而在三部集中发现的各类序文,从标题即知多为嘉靖本《芝园集》所作。此后,书商在三部集刊刻时又从嘉靖本《芝园集》中将它们取出,分配在三部集之中,以满足书籍编辑、装帧的需要。然而,笔者通过调查后发现,在四川图书馆所藏的三部集中,《芝园定集》正文前有邹守愚与江以达所作序文,文集卷尾有丰道生所作后序,而《芝园外集》卷首亦有张时彻所作的一篇《自题说林叙》,唯有《芝园别集》首尾均无序文,表现出在图书编辑与装帧上极为明显的不完整性,因此极有可能并非足本。另外,在王世贞为张时彻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张时彻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曾作防倭“经略事宜章十”^③,但目前《别集》中仅收有9篇防倭奏疏,与王世贞所记又出现了数量上的矛盾,再次反映出现存《别集》可能存在的完整性问题。

另一种可能性是,《浙东备倭议》在《芝园别集》编辑之际被漏收,而这一判断也不是单纯缺乏根据的推论。前文提到,三集新刻之时,编辑者为了书籍编订设计需要将嘉靖本《芝园集》中的原有序文转移到三部集之中,事实上被转移的不仅只有序文,原书中附带的一些时人评论,也被转移到了新书中,而且不做内容分类,一律安排在《芝园定集》正文前,冠以《芝园定集诸家评》的标题,而这一举措,暴露出编辑者在三集编订过程中的粗糙草率。在丰道生所撰《芝园集后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中华书局,2001年,第566页;《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97年,第2434页。

③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九十四《资德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东沙张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为集也,忠谏伟略,陈说厉害,卷舒惟时,奏疏有焉;本源载笃,支流克昌,扬名追孝,世谱有焉;穷理宣猷,陈古镜今,细大惟式,说林有焉;乐石煌煌,考德辩功,百世足征,碑传有焉;论政究时,宜民正俗,情好允彰,记序有焉;皇皇仁义,警于夙夜,即物省躬,箴铭有焉;环奇闳塏,铄而弗削,丽且有则,词赋有焉;祖述四诗,撷芳六代,接武贞宝,古今体诗有焉。^①

由此看来,嘉靖年间所刊刻的《芝园集》,在内容上涵盖了后刻三集所涉及的全部文体,自然也包括了《别集》的奏议与《外集》的说林部分,是故在《诸家评》中,那些阅读过《芝园集》的时人在文章中也就很自然地留下了一些针对作者这两类作品的褒赞文字,而这些内容与编辑者所定的《芝园定集诸家评》这一标题是文不对题的,因为《定集》并未收入奏议类和说林类文章。例如:王维桢在文中称张氏“叙事匹马班,议论过刘董,经济超晁贾,辞赋凌屈宋”^②,其中提到的“议论”、“经济”类文章主要是指《别集》的奏议和《外集》的杂议,而非《定集》所收的辞赋、叙传类作品,而高第的文中有“得《芝园集》,山中日夕奉颂,如侍大雅之侧,受教多矣,及览说林,益觉心醉”^③这样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其对《外集》之《说林》内容的倾服,这与编辑者所定的《定集诸家评》标题之间的矛盾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另外,前文已经提到,新刊《定集》中有若干篇撰写于万历以后的诗文,而在《芝园定集诸家评》所涉的14位时人中杨慎、李濂、欧阳德、朱廷立、徐良傅、王维桢均于万历前已逝世,根本不可能阅读过收有万历以后诗文的《定集》,而编辑者将他们的评论文字都列于《芝园定集诸家评》中,这显然有失妥当。据此,我们可以说,尽管现存于四川省图书馆的三部文集是张时彻最为完整的传世作品集,但它的编辑修订并不严谨,进一步而言,当时编辑者对张时彻作品的搜求力度和掌握程度亦堪怀疑,因此《浙东备倭议》被漏收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作者简介】刘恒武,男,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海交史。

杨心珉,男,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交史。

①张时彻:《芝园定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385页。

②张时彻:《芝园定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1册,第723页。

③张时彻:《芝园定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1册,第719页。